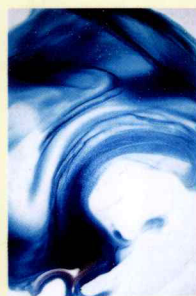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Xiandai Xifang Piping Lilun

编著

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重庆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曹顺庆

（原典读本）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编著 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体系和四个新生体系,外加一个体裁分论部分。四个支柱体系指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精神分析、形式论。四个新生体系是指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编者通过精选这些理论体系中的数十篇经典文本并适当解读,引导读者独立思考,掌握西方文论的基础知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编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0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5624-5441-0

I. ①现… II. ①赵…②傅…③张… III. ①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177 号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原典读本)

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编著

策划编辑:林佳木

责任编辑: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夏宇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25 字数:530千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5441-0 定价:3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总序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羨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与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等还与中学重复。于是只能陷入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以,我认为对高校中文课程进行“消肿”,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时,让学生多有一些阅读作品的时间,是我们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针对这种“空洞”现象,我们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课程,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应该搞简单一点,集中讲授,不要什么都讲,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在规定的学生必读书目的基础上,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查、课堂讨论、写读

书报告等。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多年来,我们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包括一些新编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体系。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文化素质教育,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相信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须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为什么是“走了样”的呢?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更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自己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或“诸子集成”,却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这是很糟的事情,是造成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

那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汇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教材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 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部教材主编如下:

《西方文化》 曹顺庆

《中国古代文学》 周裕锴 刘黎明 谢 谦

《古典文献学》 项楚 张子开

《古代汉语》 俞理明 雷汉卿

《外国文学》 刘亚丁 邱晓林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怡 干天全

《语言学概论》 刘颖

《现代汉语》 杨文全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曹顺庆

2010 年春于蓉城



前言

赵毅衡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本教科书？回答很简单：因为大学文科，开设这样一门课。编订出版此教科书，因应教学需要。但是，为什么大学要开这样一门课？而且当做一门重要的课？这就需要解释了。本教科书标题由以下词组成：原典，批评理论，西方，现代。下面简单地解释这几个词，合起来，或许大家会对这本书和这门课有个了解。

1. 为什么读原典？

为什么要读西方文论原典？做学生必须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原典，这点都能理解：读二手介绍，不能代替读原典；“今译”虽然有，大多不忍卒读。不仅意思无法正确传达，语言之美完全失落。

同样，西方理论介绍之作多矣，大学生还是应当读原典。别人的理解，代替不了自己与先哲面对面交谈。本书除了选编西语重要著作，还选出原文的精彩段落，希望学生们对照阅读，译文中相应段落已经标明，可以参考。读原文有三个好处：真正弄清楚意思；欣赏语言之美；改进我们的写作。这最后一点可能引起怀疑，实际上所谓“洋腔洋调”的中文，是“翻译腔”东施效颦。自己读西文原典，才明白各种语言都有其美不胜收之处。

翻译还有一个重大恶果，是译名歧出，术语混乱。本书特地附录了一个译名统一表，在译文中也做了相应的整理，希望在这方面对大家有所助益。

我们唯一做的妥协是：大部分同学只能读英语，本书所选不少理论家写下的原文不是英语。但是一本多种语言的教科书并不现实，幸亏欧洲语言之间差别比较小，英译依然能读出一些原文的神韵。译文中下有虚暗线的部分，可以与文后的英文选读对应。

2. 什么是“批评理论”？

以前大学中文系西语系，都只有“西方文学理论”这门课，常简称为“西方文论”，但是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都没有“文论”这个双声词。这个不规范缩语在中国学界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是中国人的语言实践不由学者控制，学术界的语言实践也不由专家控制；另一方面，“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大学占到了这个缩写词的便宜。近四十年来，各国学界为如何命名这门学

问而伤脑筋,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安之若素:“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都可缩写为“文论”。

六十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重点,已经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Literary Theory”这个词已经不适用,不仅文学批评已经多半是“文化进路”,而且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文化。文科的许多系,如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都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但是最近十多年的情况,又有变化:这门学科,目前又在溢出“文化”范围,把有关社会变迁、全球化政治等课题,都纳入关注的视野。近年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此词,一直是德国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学派称呼自己理论的专用词,直到最近,这个词才开始一般化,例如 Hazard Adams 教授主编的著名的巨册文集兼教科书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从 1971 年初版以来,已经重印多次,中国也买了版权重印。

这个理论体系,及其应用范围,的确已经开始超出传统的文学/文化之外。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因对象而界限分明。比较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推崇,对这种界限模糊化,起了促进作用。中文里,现在往往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发展,译为“批判理论”,而把广义的 Critical Theory 译为“批评理论”。

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急剧演变,迫使这个理论体系不断演变。首先是批评理论的范围急剧扩大。就其目标学科而言: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但是过于技术化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可能不算;在世界各大学的文学系里,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传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核心,这点至今没有动摇,它们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

各种文化领域——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时尚、体育、娱乐、建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甚至科学伦理(克隆、气候、艾滋等)——这些都是批评理论目前讨论最热烈的题目。显然,专业性的讨论,大部分不进入批评理论,只有把它们当作批评对象的文字,才进入讨论的视野。

而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文论”的关注点。全球化、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第三条道路、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弱势群体利益、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特别关注的目标。而要用一种理论统摄所有这些讨论,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接近哲学的抽象,例如德勒兹(Gille Deleuze)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与资本主义对抗的解放哲学;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越出“文化”的界线,例如近年的性别政治论(Gender Politics)。

所以我们在许多名为“批评理论”的文集、刊物、课程提纲、教科书(例如本书)中,会发现所选内容,大致上三分之一是文学理论,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还有三分之一是

与思想史有关(福柯称为“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这样一看,虽然“批评理论”边界相当模糊,但是这个名称,也是唯一能把这个课题集合在一起的伞形术语。

3. 批评理论的基本体系

本教科书把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体系,四个派生学派,外加一个体裁分论部分。

当代文论的第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奇(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保持了当代文化理论的批判锋芒。反过来,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批判角度进入政治经济批判。

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 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的欧洲传统哲学之延续:他们一再声称结束欧洲的形而上学,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来结束。从胡塞尔(Edmo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阐释学,本来是两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思想家手中结合了起来。加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八十年代的著名“德法论争”,显示了严谨的哲学与解放的理论态度之间的差别。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思想体系,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学派,一直遭遇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只是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一直未能展开。

形式文论(Formalism)这一体系,是批评理论中基础的方法论。这一支,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至今并没有结束,“文化转向”是其延续方式之一。符号学(semiotics)与叙述学(narratology)自身的发展,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推进到文化。当代文化的迅疾变形,使符号学研究出现了紧迫感:一方面形式论必须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必须扩展到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公分母”。

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惯例: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中几种的结合。七十年代前,两个体系结合已经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主要就是糅合精神分析;拉康从事的是心理的符号分析;利科的工作重点是把阐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结合体系的方式推进到新的领域:克里斯台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开创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齐泽克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推进到全球政治批评。

当代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的形态出现。结构主义发展到“后结构主

义”(Post-Structuralism),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几乎都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则研究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足以决定历史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Feminism)与其后继者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看作被“理所当然”的男性霸权之后的学说,那么六十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的确有“四个后”的主要分支。

应当承认:对批评理论作以上的切割总结,虽然整齐清晰,但是覆盖面不够。为社会学批评做出巨大贡献的韦伯(Max Weber)、西美尔(Georg Simmel)等人,努力恢复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自由主义(Liberalism)者如罗尔斯(John Rawls)或阿伦特(Hanna Arendt),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者如施密特(Carl Schmitt)或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新的思潮如生态主义,就不容易安放在这个图式中。可以辩护说,这些都应当属于社会科学,政治学,或是哲学,但是相当数量的批评理论教科书,也会收入他们的文字:我们强调批评理论的开放性,但是本书篇幅有限,只能给这个学科画出一个简明清晰的图景。

的确,批评理论边界已经扩大,而且会继续扩大,这给文学批评开阔的视野:无论是方法,还是对象,批评理论已经完全改造了文学系的思想方式。但是我们还是不想忘记文学艺术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中还是特辟一章“体裁分论”。无法覆盖所有重要体裁,现在的格局,只留做一个提醒。

4. “西方”理论

为什么这门课程叫做“西方”理论。

首先,批评理论是不是“西方”文论?应当说,是的。第一,从主要参与者来说:以上的四个支柱理论体系和四个“后”体系,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学者。

实际上,在英语世界,常常把批判理论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在主要的批评理论家中,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思想家占了一大半,英语(英国、美国、澳洲),斯拉夫语(东欧、俄国),以及南欧的思想家比例较小,与幅员版图和高校数量不相对应。其中原因,与文化根子有关:德国与法国,是对欧洲古典哲学传统承继最多的民族;英美,受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之累,高校再发达,也只能起鼓风作浪的传播作用;东欧俄国与南欧,则明显受制于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发展程度。因此,“欧洲大陆理论”,是相当合理的说法。

欧美之外的人,对批评理论起过重大作用的,主要是“后殖民主义者”。这一派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在英美受教育,并且在英美大学执教的阿拉伯人和印巴人。为什么东亚(中日韩)在西方的学者,只在地区问题研究中起作用,没有能把自己的理论一般

化？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民族，不像阿拉伯与印度与西方直接对峙几百年上千年——对峙本身就是另一种你中有我的交流。

甚至，后殖民主义者阵营中，也没有留在阿拉伯与印度次大陆任教的学者。个中原因，不完全是英语水平，而是他们面对完全不同的体制。在西方，批评理论阵营批判的对象是西方体制，因此后殖民主义依然是一种西方理论。

5. 为什么是“现代”？

20 世纪已经过去，而批评理论的发展已经超越 20 世纪。本书所选文字虽然大都出自 20 世纪，这是因为经典著作的认定，有一定的时间滞后，但是这个局面不会延续下去，本书列出的“延伸阅读”已经有许多 21 世纪的作品。这门课再自称“20 世纪文学理论”，已经不通。我们也无法用“当代”一词代替“20 世纪”：西语中 Contemporary 这个词指的是“同代”；在中国学界，各科目的“当代”比“现代”还要长，已经成了一个窘迫的问题。

权衡再三，最合用的应当是“现代”一词。虽然欧美历史上的“现代”（Modern）一词意义多是与“古代”（Antique）相对，那就是从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开始的所谓“现代”，但是 modern 一词的第一义，是“至今的近年”（《牛津词典》定义：“of the present and recent times”）。这也是中文“现代”的第一义（《古今汉语词典》定义：“现在这个时代”）。因此，这是个方便又准确的措辞。

更重要的原因是：批评理论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学术回应。西方批评理论，是 20 世纪初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没有任何人际族际协调地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不了解马克思，胡塞尔不了解索绪尔，雅克布森不知道瑞恰慈或艾略特，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我们在第一代奠基者那里，找不到任何有意的应和。

20 世纪初，这些独立的思想者都发现，有必要从现象后面寻找深层的控制原因：葛兰西在阶级斗争后面找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弗洛伊德从人的行为方式后面找到无意识中里比多的力量，胡塞尔从经验与事物的关联中找到意向性这一纽带，而索绪尔与皮尔斯分别看到人类表意的符号组成。这些思想是不约而同的“星座爆发”，是文化气候催生的产物。正因为它们是对同一个文化发展的思想应对，它们对表层现象有共同的不信任，这种不约而同的立场，为它们日后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批评理论确是欧洲文化土壤上自动长出来的东西，原因相当明白：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首次出现了现代性的挑战，学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文化压力。而那个时候，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出现这种文化对思想的压力。19 世纪的欧洲，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理论，那时欧洲有文学理论、文化思考、哲学探讨，学科之间并没有构成一个运动的自觉联系。批评理论的突然出现（虽然这个名称是近年才有的），是思想界对现代性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启用“现代”一词：它是批评理论所处时代



的名称,它也是这个理论针对的对象^①。本书题目可能有人会觉得有争议,实际上这是唯一说得通的方案。

由此,我们可以辩明另一个问题:既然19世纪的西方没有批评理论,19世纪的东方(例如中国)没有这种理论,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了。等到20世纪现代性的挑战成为世界现象时,翻译已经发达,国际学界交流已成常规,大学教育成为思想融合的阵地。此时东方(包括中国)的批评理论,已经不可能与世隔绝单独发展,而且,世界批评理论今后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东方学者,因为东方国家已经进入现代。

近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一套新的价值观:例如多元文化、地方全球化、弱势群体利益、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回顾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这些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结论是什么呢?批评理论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国文论对接,也完全可以与现代中国对接,更可以与当代中国对接。当代中国的文化气候,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对接。

也就是说,批评理论的当代化,与“西方理论中国化”,正在同时进行,可能不久,我们就可用前一个命题,代替后一个命题。

本书的编写,三个编者有分工:傅其林负责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两个部分,及体裁分论的“贝尔”一节;赵毅衡负责精神分析与形式论部分;张怡负责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体裁分论部分。术语译名表,由赵毅衡负责。全书编辑写作过程中,三人通力合作,互补互助,互相坦率地提出修改意见。因此,有错误不当之处,我们共同负责。

因时间仓促,本教材所引用的某些文章及译文未及与著作人联系,见书后,请有关著作权人与重庆大学出版社或重庆市版权保护中心联系。

① 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的同类书,为“现代”一词辩护。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三联书店;甘阳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三联书店;安纳·杰弗里,戴维·罗比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罗吉·福勒著《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杰弗逊著《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西语中则更多批评理论著作或编著都用 Modern 一词。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巨作《The Modern Mind》,中文本译成《二十世纪思想史》,时间暂时对,时代不对,对象不对。

目 录

I 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	5
• 原典选读 现实主义辩	7
本雅明	13
• 原典选读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14
巴赫金	21
• 原典选读 长篇小说的话语	23
阿尔都塞	29
• 原典选读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30
詹姆逊	37
• 原典选读 文化与金融资本	38

II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

英伽登	49
• 原典选读 现象学美学:其范围的界定	50
萨特	57
• 原典选读 为何写作?	59
海德格尔	65
• 原典选读 艺术作品的本源	67
加达默尔	73
• 原典选读 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	75
姚 斯	80
• 原典选读 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82

III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92
• 原典选读 创作家与白日梦	94
荣 格	102
• 原典选读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104
拉 康	110
• 原典选读 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	112

IV 形式论

什克洛夫斯基	123
• 原典选读 作为技巧的艺术	125
艾略特	132
• 原典选读 传统与个人才能	133
索绪尔	141

· 原典选读 语言符号的性质	143
皮尔斯	148
· 原典选读 像似,指示,规约	149
雅柯布森	156
· 原典选读 隐喻和转喻的两极	157
巴尔特	163
· 原典选读 作者之死	164

V 后结构主义

福柯	173
· 原典选读 人文科学	175
德里达	181
· 原典选读 外与内	182

VI 后现代主义

格林布拉特	194
· 原典选读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196
德勒兹	202
· 原典选读 块茎	204
利奥塔	212
· 原典选读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214
布迪厄	221
· 原典选读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23
波德里亚	230
· 原典选读 仿真与拟象	232

VII 性别研究

伍尔夫	243
· 原典选读 一间自己的房间(第四章)	244
巴特勒	252
· 原典选读 模仿与性别反抗	254

VIII 后殖民主义

安德森	265
· 原典选读 民族意识的起源	267
萨义德	274
· 原典选读 东方主义	275

IX 体裁分论

庞德	286
· 原典选读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	288
贝尔	295
· 原典选读 艺术	296
麦克卢汉	303
· 原典选读 媒介即信息	305
20 世纪文学/文化理论术语与人名表	313



I 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初以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垄断资本主义向跨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型,它面临巨大困境,同时突飞猛进,从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展露出迥异于 19 世纪的社会面孔。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始终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一把利刃插入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核心,激进地从不同角度建构人类的非异化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式,为理想的人类存在设计了一幅幅美丽的蓝图。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等人的经典著作进行重新解读,融入 20 世纪新兴的哲学社会思潮,植根于现代西方具体的现实文化问题,体现出理论的实践性、批判性和跨学科性,其理论形态丰富多彩,具体派别迭起纷呈。“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以 1923 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标志性的起点,包括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构成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部分。这些不少出自资产阶级上层的富裕家庭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从黑格尔哲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的,如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这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整合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如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这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从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如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这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从语言哲学、结构主义来重读马克思的著作的,如法国的阿尔都塞等,这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把犹太神学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如充满原创性思想的本雅明,等等。



可以说,20 世纪主要的哲学思潮都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这些都可以说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表现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创造性。

文学艺术、文化现象是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它重新张扬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视为一位哲学家而不仅是社会革命家,于是以卢卡奇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竭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意识的理解,意识哲学与文化问题成为绕不开的重要问题。文学艺术理论也因此成绩斐然,一个个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概念,诸如“文化工业”、“灵韵”、“物化”、“机械复制艺术”、“艺术话语”、“狂欢化”、“新感性”、“解异化”、“形式的意识形态”、“文化逻辑”、“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文化唯物主义”、“情感结构”、“沉默”、“征候阅读”、“多元决定”、“发生结构主义”、“认知图绘美学”,等等,深深影响了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西方现代最重要的文艺理论之一,这在西方是有目共睹的,谈及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著述也几乎不可能不谈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涉及诸多核心问题。它对文艺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看重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认为文艺是审美的,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不过在很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看来,文艺的意识形态不是基于文艺作品的内容,而是立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的形式,通过文学形式的创造,通过一种具体的感性的审美性来含蓄地呈现意识形态,审美地反映现实社会和人的存在状况。通过注入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文艺的本质成为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结构关系,形式表达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促进了文艺形式的生成。如果说文艺作品是一种具体的话语,那么这种话语不是孤立绝缘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与社会、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话语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则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典型。

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认为文艺的力量在于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是对非人性的资本主义存在的批判,因此文艺自由的审美表达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具有解异化的功能,为人的自由的意识与感性丰富的个体生存打开了一片亮丽的风景,人在审美中从特殊性走向了自由的个

体性,用卢卡奇的话说就是走向了“人的整体”,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碎片式的物化生存。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始终关注当下的文化现实,对不断升温的大众文化给予辨析,既有本雅明对摄影、电影等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也有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尖锐批判,还有英国伯明翰学派中威廉斯、霍尔对电视等媒体文化的负面性和受众的不同选择的研究,以及詹姆斯对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图绘,这些形成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型。同时,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不仅持续对现实主义进行研究,还热衷于浪漫主义,尤其是关注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挖掘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形式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持续不断的活力与阐释的有效性。

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体现出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等密切的关联,焕发着光彩,所以本部分选取了卢卡奇、本雅明、巴赫金、詹姆斯、阿尔都塞五位理论家来介绍,虽然可以借之一窥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但远远不能概括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情况。下面就做一些补充。

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在监狱中遭百般折磨后写下的32本共2848页的《狱中札记》。在此著作中他以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异常关键,是确立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因为文化被整合到领导权之中,从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领导权的确立是在实践中、行动中以及心灵中进行,所以任何统治权力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暴力机构方面,还体现在文化霸权方面。同样,要确立新的领导权,也就必须推翻旧有的文化霸权,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理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基本范式,也为1968年后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

德国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系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三“M”。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把黑格尔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尤其是充分吸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了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尔库塞认为现实是异化的,按照现实原则起作用,人类文明就是压抑的历史,而爱

